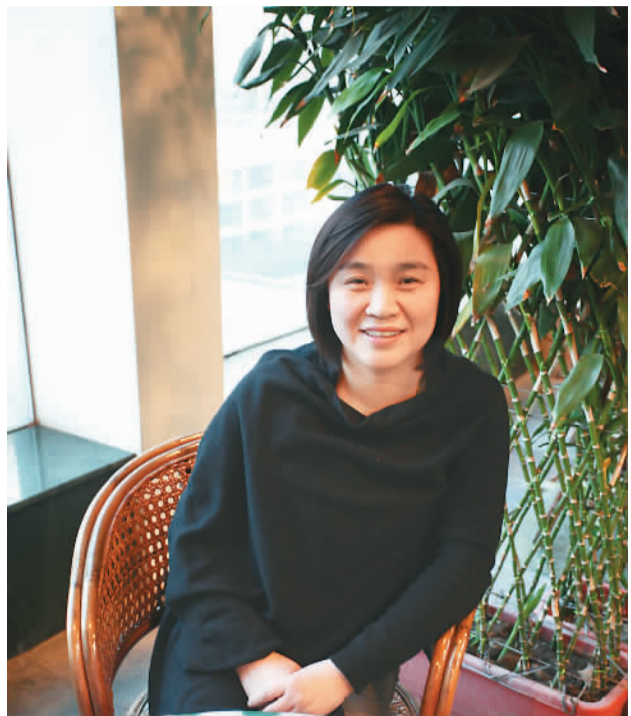


□作家近况

梁鸿：追寻大地和生活

黄德海



梁 鸿

早在梁鸿因两本“梁庄”广为人知之前，我就读过她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方面的文章，材料功夫细密，论述干脆利落，显示出扎实的学术准备和攻坚克难的决心。说起来有些狂妄，我当年阅读这方面的文章，并不是想着学习，而是为了放弃——如果一个人没有在文字中清晰地表达出自己内在的卓越，我不再关注。梁鸿呢，虽然在文章里有些自己的心得，总体还笼罩在所谓学术的框架里，读下来偶有所得，却也谈不上太大的启发。我本想果断放弃关注，但不知为什么，又偶尔会想起她文章中的话，仿佛写下了某些灵光闪耀的时刻，因此就一直放在了留心的名单中。

大概是因为留心，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版的时候，我就买了一本，读罢，不禁有点吃惊。在这本书里，我看到一个处于倾颓和流散之中的乡村，那里充满破败和衰老的气息，正与我感受到的家乡境遇一致。尤为难得的是，梁鸿在写作中有意识地克服着外来视角，作为其中的一员，把自童年开始的乡村经验，和她用心感受着的颓败乡村的喜悦哀惧，一起写进了书里。或许正因如此，这本书摆脱了关于乡村的作品里习见的牧歌或挽歌气息，掀开了被很多人主动遗忘或被动屏蔽的现实帷幕，让人意识到一个不断处于变化中的世界，听到它的喘息，看到它的伤口，感受那与我们置身的息息相关的一切。

在这本书的后勒口上，印着梁鸿的一张照片，圆脸、半长发，笑容里还有着校园时期的青涩，衣服看起来也不甚合身，让人觉得她还没有完全长成自己的样子。看过《出梁庄记》，我更加深了这个印象。这本书，几乎是《中国在梁庄》的延伸作品，梁鸿继续着对乡村的关心，去追踪一群离开梁庄进入城市的人。这是值得好好书写的一群人，梁鸿也写出了他们普遍的窘迫和卑微，辛劳与困顿。从这本书的材料准备和后期整理，能看出她所费的心力，也能感受到她急切地想要做点什么的用心。因为没有童年和少年经验可以借鉴，这花费了心力的作品让人觉得不够细密，能看出未经好好消化的痕迹，很多地方裸露着采访时的粗粝毛糙。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是采访，《中国在梁庄》基本上避免了的外来视角，大面积地侵染着这本书，我们虽看到了离开家乡的人们艰难的生存境况，却也似乎看到他们对录音笔略带警惕的眼神。

读完《出梁庄记》后不久，我在一次会议上见到了梁鸿，不禁对自己引以为豪的相貌判断暗叫一声惭愧。此时的真人梁鸿，早就褪去了照片上的青涩，面部的线条由圆形趋于向上，一件风衣也让她显得干练挺拔。在那次会上，梁鸿没说几句话，却让我受到了触动。她说在写“梁庄”系列之前，自己越写文学评论方面的文章，越觉得离这个世界的实情远，因此放下当时的写作，回到了生养她的梁庄。在那里，她说自己遇到了真问题，以后会沿着这真问题写下

去。应该就是这个真问题，促使梁鸿写下了“梁庄”系列文字，也让她慢慢长成了自己的样子。我向来相信，一个人有了自己的样貌，摸准了自己的语调，听到它的喘息，看到它的伤口，感受那与我们置身的息息相关的一切。

即便如此，我仍然对梁鸿进一步的写作抱着谨慎的乐观态度。那些生活在梁庄内外的人们，虽然有着属于自己的穷苦、挣扎和不一样的命运，也有作者的同情在里面，但大多没有自己独特的精神生活，因而也就看不到他们每个人清晰的纵深背景，“梁庄”系列还差不多是一幅前景和后景交织在一起的画。或者说，梁庄中人，都还孤零零地突出现在一个荒凉的背景之上，单纯、明确、坚决，指向的似乎都是一个个极难解决的社会问题。我很怀疑，这种背景与人的分离，正是书写乡村者最该意识到的悖论——跑得最快的现实（背景）抛下了行动迟缓的人们，难道不是写作者为某种方便虚拟的境况？现实和背景，不从来是应该跟人长在一起的吗？

还等我的怀疑生根发芽，勤奋的梁鸿就写出了她的“吴镇系列”《神圣家族》。或许会有人以为，写出非虚构“梁庄”的梁鸿转而写虚构的吴镇，是为了文体的试验或是出于某种虚荣，我却觉得，这是梁鸿感受到的那个真问题的驱使。比“梁庄”系列深入一步，在这本书里，人物连同他们的纵深背景，被一起放置在一个混沌得多的世界上。《神圣家族》里不时提到的

《民族文学的书写与构建》一书，是阿扎提·苏里坦新近出版的一本文学评论集，我通读后掩卷而思，这不仅仅是一部对新疆文学的梳理，更是一部了解当代维吾尔文学的百科全书。

阿扎提·苏里坦在全国评论界是重要作者之一，他的这部评论集见证了新疆文学的成长，对新疆维吾尔作家和诗人进行了客观的、公允的、充满感情的评介。

在《民族文学》创办维吾尔文版过程中，我有幸认识了阿扎提·苏里坦。他对《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的支持与关心，至今令年轻编辑感动不已。《民族文学》杂志社每年在新疆召开维吾尔文版、哈萨克文版的作家翻译家座谈会和培训班，阿扎提·苏里坦有几次是从外地专程赶回新疆的，他那鼓舞人心的讲座、语重心长的谆谆教诲，成为每次培训班的最温暖人心亮点。

翻开《民族文学的书写与构建》，让我对祖农·铁依甫江、吾提库尔·霍加、阿斯

算命打卦、求神问卜、各路亡魂、各种禁忌、各样礼数，都跟人生活在一起，参与着人的日常决定。人的各种行为，都牵连着一个个更深更远的世界，由此构成的复杂生活世界，所有的行为都复合着诸多不可知和被确认为理所当然的元素。这些元素氤氲聚集，跟可见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吵架拌嘴一起，用丰富刻写着吴镇的日常，也纠正着人们对乡镇只被经济和现代精神统驭的单向度想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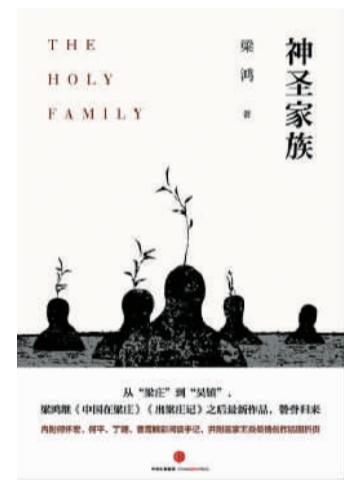
这个容纳了各样复杂礼俗的精神世界，是“吴镇”较“梁庄”多出的一部分，既显现了乡镇生活丰富的一面，却也提示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这一涵容了复杂精神层次的心灵世界，早就在被揭穿之中，与此相关的乡镇风习，也在被逐渐荡平，呈现出较为单一的样式，从而使精神生活有了城乡同构的趋势。在这个镇子上，你会看到温情善意和戒惧，少年人无端的落寞；你会看到颓废，孤独，很多人变得抑郁，自杀形成了示范效应；你会看到倾诉、崩溃和呆滞……毫无疑问这就是现实。只是，在这个现实里，人并不是跟不上时代的落跑者，而是跟各种现实牢牢纠缠在一起。

《神圣家族》里的人物，往往声口毕肖，有他们各自的样子，也有各自复杂的心事。读着读着，你堪堪要喜欢上某个人了，却发现他有自己的缺陷；刚刚对一个人心生厌恶，他却又做出让人喜欢的事来。这是一个无法轻易判断是非对错的存在，你轻易论断了别人，别人也会反过来论断你。在这样一个世界，

你应该多看、多听，多体味其中的无奈、辛酸以及笑容，如此，吴镇，甚至所有大地上的村镇，才不只是一个人实现自己雄心的泥塑木偶，人们也才真的会显露出自己带有纵深的样貌，愿意与我们生活在一起。梁鸿几乎是主动承担起了在两个世界里穿梭的责任，不管乡村怎样衰颓，精神的转化多么困难，周围的环境多么糟糕，她也不抱怨，也不解释，也不等待，不以这些为借口退出一个世界过自己的安稳日子，而是忍耐着两个世界的撕扯，做自己能做的，既让自己不断向前，又为未来的某个改善契机积攒着力量。或许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在《神圣家族》的无奈和悲伤之上，感受到隐秘的活力。

没错，这隐秘的活力，就源于梁鸿对准真问题的不断精进，那无限广大的乡村，无量无数的人们，仿佛都跟她有关。她得一面感受着这休戚相关，一面用自己的文字把这相关表达出来。如此的相关，甚至至于未来乡村的重建，精神产品的丰厚，都并非一个既成的事实，而是需要我们一笔一划写出来的。跟着这认真的一笔一划写下的，也是每个写作者自己的命运：“如果他无法迫使自己相信，他灵魂的命运就取决于他在眼前这份草稿的这一段里所做的这个推断是否正确……没有这种被所有局外人所嘲讽的独特的迷狂，没有这份热情，坚信‘你生之前悠悠千载已逝，未来还会有千年沉寂的期待’——他也不再该再往下做了。”

前几天见到梁鸿，发现她在干脆利落之外，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眉目间多了点忧思。这忧思虽只是偶尔闪现，却可以判断是来自最具体的地方，因而也让她自我更加具体地冒出来。她说起手头正在写的一个较长的叙事作品，还有她藏在心里的好多研究计划。语速很快，那些正在和将要被写到的东西，似乎已经迫不及待要冒出头来。我一时没有完全弄清楚她要写的究竟是什么，但可以确认的是，不管梁鸿要写什么，也不管她用哪种方式写，这个已经把切身的忧思加进了自我样貌的人，都该在我的关注范围之内。



□作家谈

九十一一个字的剧本

叶延滨

最近不太看电视剧了，有些叫得很响的电视剧，开头两三集还能看下去，再往下看，真的很考验人的耐心了。家长里短的戏，一集电视下来，能吵上一架，或发生一个误会，马上就进入广告时段。如果是谍战匪警类的电视剧，进进出出，追追打打，要占去大半集电视时间，能拆开一个扣儿，或引出一条新线，就算这一集有戏了。不知有人统计过没有，我们的电视上的抗战戏，消灭的鬼子比世界上曾经有过的鬼子，不知要多出多少倍？正热的谍战剧，潜伏在大小城市里的特工人员，也许比各个战场上的士兵还要多！影视业大量的需求，与相对贫乏的资源（特别是编剧脑子里的资源），使得渗水和泡沫成为常态。与思想保守无关，也与五毛零钞无关，一般观众如我，闲来无事打开电视，总像重遇一个故事：走进饭店，问老板有什么吃的。老板答，兔子汤。过一会儿，端上一盆清汤。问，兔子呢？汤里熬着。汤也没有兔子味呀。老板说，对不起，你来得晚了，前天卖炖兔子，昨天卖兔子汤，今天这就是兔子汤的汤了。

电视剧的供需差，特别是广告业要求“长剧”，使兔子汤的汤成为常态。戏剧保持较有滋味的办法，只有一条，故事有冲突和人物关系有发展。宫廷戏之所以相对能吸引人，就是有着较丰富的人物关系，人物关系的发展，引出一个又一个新的冲突。只是当下的宫廷戏成了后宫戏，脂粉裙衩里说事。我们的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其中真有不少精彩的编剧教材。比如《左传·桓公十五年》，写了一段郑国大夫祭仲与两位王公的政治斗争，不到一百个字，写尽了国事、家事、亲情、权谋。短文只九十一字，如下：“祭仲专，郑伯患之，使其婿雍纠杀之。将享诸郟。雍姬知之，谓其母曰：父与夫孰亲？其母曰：人皆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将享于郟，吾惑之，以告。祭仲杀雍纠。尸诸周氏之汪。公载以出，曰：谋及妇人，宜其死也。”以上一场整个郑国上层斗争的大戏，《左传》仅用了九十一字完成。在这不到百字的文字中，有九层人物关系和戏剧冲突：

一，“祭仲专，郑伯患之”。七个字写国家大局，祭仲还在掌管郑国朝政，这让他即位当了郑伯的公子实心里忐忑不安。背景是因为祭仲支持另一个公子忽。

二，“使其婿雍纠杀之”。七个字写宫廷政治谋划，从政治扯出了亲情，女婿这一新人物关系出场。政治与亲情发生冲突。

三，“将享诸郟”。雍纠接受杀死丈人的密令，不好在家里设宴动手，于是在郊外设宴请丈人，以便席间动手。

四，“雍姬知之”。这件事让雍纠的老婆知道了。引出又一个人物关系。丈夫请父亲吃饭不在家，跑到野外，雍姬觉得此事蹊跷。

五，“谓其母曰：父与夫孰亲？其母曰：人皆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这是核心桥段，母女间对话。女儿不说丈夫欲谋杀父亲，只是问，父亲与丈夫哪个更亲？母亲更是直言，天下男人多得是，父亲就只有一个。在政治斗争中，女人立场就是亲情更重！

六，“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将享于郟，吾惑之，以告。”雍姬之妻于是向父亲说出了自己的疑惑：丈夫不在家请客，跑到野外设宴，爹爹要当心啊。局面发生改变，祭仲一出就掌握大局。

七，“祭仲杀雍纠”。宫廷政变逆转，五字呼应开头的三字“祭仲专”，真是大权在手。

八，“尸诸周氏之汪”。祭仲杀了雍纠把其尸陈在周氏池塘旁，这又将亲情转成政治斗争，光天化日下摆尸给郑国君主看。

九，“公载以出，曰：谋及妇人，宜其死也。”十三字的大结局，郑伯外逃，走时还带走了雍纠的尸体。这是政治同盟的结局。借郑伯的口也说出了这场政治斗争提供的前车之鉴：政治谋略让女人知道了，死了也活该啊！

一场宫廷政治斗争，九层戏剧冲突，九十一字完成，惜墨如金啊。更重要的是，在九十一字的短文中，写出了多重人物关系，亲情与政治，家事与国事，不同的立场引出的戏剧性冲突，不同的人物关系推进了故事发展与逆转。建议把这样的古文，当做编剧教材。文字精短，九十一字，人物关系，戏剧冲突，步步生景，层层推进，像一只会打洞，会下崽的活兔子。对了，要紧的不是端出一盆兔子汤的汤，而是逮住一只活兔子啊！



长篇小说《芙蓉外史》揭示山乡变迁

长篇小说《芙蓉外史》研讨会日前在浙江省永嘉县芙蓉村的美蓉书院举行，这部由温州农民陈晓江创作的长达150万言的长篇小说所展现的是，曾在中央电视台热播过的《记住乡愁》中的一个千年古村落——芙蓉村的山民，在从民国初年到上个世纪“文革”结束的整整一个“甲子年”的蹉跎岁月和社会变革中，所经历的死灭和重生、抗争和屈从、荣辱和升迁、变迁和发展、苦难和辉煌。作品通过大量事实的生动形象的描写，真实地揭示了山乡人民在一个个可歌可泣或喜或悲的历史变迁“活剧”中的本相。评论家认为，小说集楠溪山乡风俗民情、方言土语之大成，堪称浙南乡村60年来发展变化的缩影。（塞峰）

□新作评介

新疆人的一面旗帜

阿扎提·苏里坦文学情怀

赵曼彪

